



《国际儒学研究》第12辑论文“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6-2-22 17:43:44)

作者：刘示范

台北学者以儒学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的关系为例，说明儒学对回应“全球化”仍具有的巨大力量。指出：由于亚洲四小龙均受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引起一些学者探索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兴趣。他们认为，儒家的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如家族主义、和谐、忠诚、尊重权威、群体取向、重视教育，以及勤劳节俭、鼓励储蓄，等等。这些就是“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这位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化，对待传统的态度，不能一味的破坏打压，拿儒家而言，既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已根深蒂固，绝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可以连根拔起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如何去转化它“推陈出新”，成为现代化、“全球化”的最佳资源。事实证明，近百年来，儒家一直背负了历史文化的原罪，所有的矛头都对准它，但是，从来打不死，只要一有机会，它立刻死灰复燃，如今更借壳上市，不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对“入世”与“全球化”也都是极为有利的。中国文化的“体”正是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儒家的伦理观与价值观，更何况儒家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世界主义”或“全球化”的思想，所谓“世界大同”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与今天的“全球化”或“地球村”的理念，本质上是一样的。

香港的学者指出：英国汤恩比曾经说，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四至五百年，仍是烽烟四起，人欲横流，看不出人类未来的前景，儒家孔子思想如果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世界和平的难以实现，充分证明汤恩比预言的准确性。而事实上，离开了孔子思想，背弃了孔子“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等等教诲，则是国无宁日，世界很难达致永久太平。儒学适应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力量灌输和强加的，而是出于人类社会道德生活自身的内在需求。儒学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可成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和人类道德的基础，应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的儒学人文精神，通过文明对话、交流及各种形式的推广、教育和传播，发挥出更大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使之超越东方民族、东方文化的范畴和地域界限，而更具世界意义。

韩国学者总结东亚发生的变化指出：儒学将成为21世纪东亚乃至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的理念的代替者。包括新儒学传统，人与自然一体化，对世界有机论的看法，个人主义优先的共同体理论，代替直线思考的螺旋式思考方式，从矛盾的相克中实践相生的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中，依据相互原理可以解决所有矛盾，宇宙与人生各有机统一的思想为在困惑中煎熬的西欧社会打开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传统的价值理论中，特别是儒学中关于家族、社会共同体的普遍理论，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必要要素，仍将“全球化”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共同体意识和共生意识，是当今我们在应对“全球化”时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发扬的儒教观念。

来自美国的学者在论述了关于“全球化”的一些不同的理解之后指出：儒学在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及其价值的实现，是客观的、历史的，如孔子再三讲述的礼、义、仁爱、忠、信、孝悌、“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尊重人的个人尊严和价值的思想；还有孟子反复讲的仁义、民本、人性善、仁民爱物等等观点和思想，具有巨大而普遍的包容性。这些思想均合乎人性、合乎自然，合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观，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今天、明天和永久的未来，均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自然也是适应“全球化”要求的。但是同时又指出：“和而不同”固然正确，但在今天的强权或霸权的背景下，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和而不同”也是不现实的。

还有学者对于“全球化”中的人际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在“全球化”中，人们必须学会“相处”之道，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中的一些经典论述，为我们应对“全球化”提供了良好的“相处”之道的思想资源。这位学者指出：对话，对于不同文明之间增加了解，寻求共识，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对话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即使有了了解，而缺乏一种立己立人或己立立人的心态和诚意，同样不可能将对方转化为自己学习的导师，甚至不能视对方为平等的朋友。假设了解是为了获取对方的情报，以便寻求机会打倒、制胜对方，这种了解就更让人失望、生厌。在“全球化”的今天，学会相处，比练习对话更为重要。而相处是一种艺术、一种智慧，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软得看不见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氛围。那么，人，何以自处？何以与人相处？何以在家、国、天下中相处？乃至何以

与天地万物相处?这些问题,一直是儒家学者思考的中心。这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中必须思考和解决的基本问题。而在诸多理论和答案中,儒家的挈矩之道、忠恕之道、和而不同及仁民而爱物思维方式和人文情怀,天下一家的意识等等,都是相处之道的精华。可以肯定,在“全球化”过程中,学会儒家的相处智慧,乃是家和、国安、天下太平、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最佳选择和最明智的选择。

还有学者根据“普世伦理”的内容、性质,对《论语》的道德哲学内容作了些梳理,认为《论语》中的仁者“爱人”、“孝悌”、“以义制利”、“政者,正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重大节而不羞小辱”等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都是“普世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由此说明儒学在应时“全球化”,为人类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是能够大有作为的。

三、儒学何以更好地回应“全球化”的挑战。

有些学者在认真地对儒学中的有关概念、判断、命题和论述作了些有意义的梳理后指出:儒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精神文化资源,其中仁爱,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庸之道,苟日新、日日新,保民、重民和民为邦本,仁民而爱物,王道政治哲学,制民之产的经济观,以及儒家的原始人性论、平等观、人权思想理论、商品意识,等等,对于这些概念、判断和命题,我们今天应当按着其本身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特质,结合“全球化”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的实践任务,进行科学的诠释和创造。在“全球化”的挑战中,儒学发展的天地还是极为广阔的。

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客观要求,使传统儒学开出新的生命,有的学者对于儒学普世化的品格和儒学普世化在全球化中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等,也进行了理论的深入思考和发掘,进行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实际工作,帮助人们拓展了思考和实践的空间。这些学者的思想和行为,深深感动了与会学者。

还有的学者指出:面对全球化的实际需要,把儒学的伦理原则转化为主体间交往的原则,从交往观的层面上发掘儒学的“全球化”价值,可能会得到多极交往主体的更多认同和选择,从而促进儒学走向世界,更积极主动地回应“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使中华民族和中华传统文化巍然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也有的学者指出:对我国先秦儒家的社会秩序观,进行一些调整、充实的工作,在今天“全球化”中是可以开发出丰富而巨大的现代价值的,对于保证人类社会在正确轨道上快速而有序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有些学者还对于当代新儒学为“全球化”提供的思想资源及大师们为儒学现代化作的巨大努力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了些有益的勾沉和梳理。

有的学者指出,汉字是中华文化承传的载体,对传播中华文明有特殊功能。汉字的鲜明形象性、偏旁部首的高度抽象性、字音字意的独特性及文化传承的功能都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性,因此,对汉字改革一定要十分认真和严肃。

对于儒学在“全球化”中的宗教性和宗教化问题,有许多学者阐述了真知灼见。有的学者认为,儒学确有宗教性的特点,从儒学的普世化来看,循着儒学的宗教性而使儒学宗教化,或许对儒学自身的发展和发挥儒学在“全球化”中的作用都会有益。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1)儒学自身的质是不是宗教?(2)应该不应该将儒学变为宗教?(3)能不能将儒学变为宗教?这些不同的观点不仅表明这些学者为自己肩负的社会历史使命感的担当精神,也为人们进一步思考儒学的特质和儒学的生命提出了新的思考纬度。

(刘示范)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